

朱熹詩集

鍾元章
夏章

選註

葉元章 鍾 夏 選注

朱彝尊選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滬新登字 109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

朱彝尊選集

葉元章 鍾 夏 選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祝橋新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 17.25 插頁4 字數392,000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1—3,000

ISBN 7-5325-0483-2

I·285 定價: 7.4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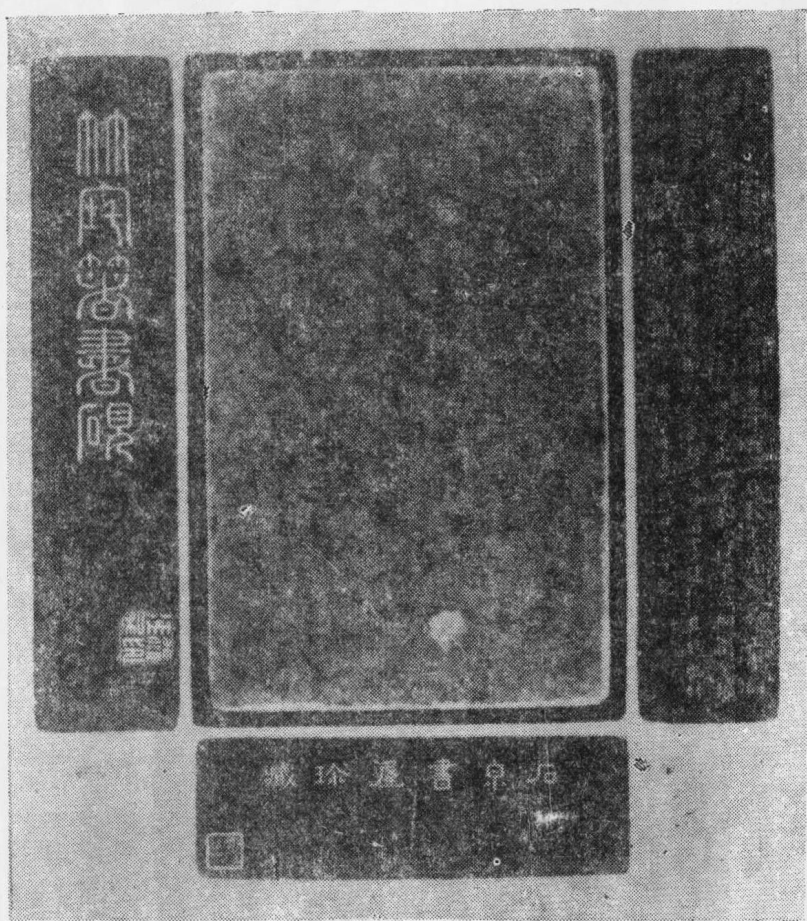
北垞南垞北中
 有曝書亭空明無
 四壁八萬卷家環
 儲鼠銜鏡懶祭魚
 壯甯平學老著書
 一片端點石晨夕
 心相於密厥衆授
 孫子千畝名身後
 事丁亥三月既望
 書北朱彝尊銘



草堂
 書屋







四 圖

前言

朱彝尊（一六二九——一七〇九），字錫鬯，號竹垞，晚號小長蘆釣師，又號金風亭長。浙江秀水（今嘉興）人。他是清初極負時譽的文學家，浙西詞派的創始人。其詩與王士禛齊名，時稱「南朱北王」。他學識淹博，出經入史，精於考覈，勤於著述。輯有《經義考》三百卷，《日下舊聞》四十二卷，《詞綜》三十卷，《明詩綜》一百卷，均流傳於世。又撰有《瀛洲道古錄》、《吉金貞石記》、《粉墨春秋》、《禾錄》、《離志》諸書。晚年手自刪定《曝書亭集》八十卷，收入一生主要作品，性質略近於全集，流行甚廣。中年時，曾自編《南草草》、《竹垞文類》及《騰笑集》行世。

一

朱彝尊出生於浙西嘉興梅里（今王店）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。曾祖朱國祚，字兆隆，明萬曆十一年（一五八三）狀元，授翰林院修撰，歷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，攝本部尚書事，萬曆二十六年（一五九八）入東閣，後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致仕，卒贈太傅，謚文恪。這是朱氏最顯赫的一代，也是竹垞經常提及而引以為榮的。祖父朱大競，國祚長子，由蔭生除授都察院照磨，擢工部主事，坐事獲譴，思宗即位後，出任雲南楚雄知府。不久，奔母喪回籍，卒於家。竹垞之父朱茂曙，未仕，學

者稱「安度先生」。撰有《兩京求舊錄》。竹垞係其長子。

竹垞早慧，有神童之目。《國朝先正事略》及朱桂孫、稻孫所撰《祖考竹垞府君行述》都曾提及竹垞生有異稟，「書過眼不遺」。後者還說到乃祖從小才思敏捷，出口成章，「於詩藝尤工」。幼時，塾師舉「王瓜」命作對，竹垞應聲曰：「后稷」。所叙或不無誇飾，亦可見竹垞聰穎和幼學根柢之一斑。

竹垞少時摒棄科舉仕進之路，其原因除了家道中落，貧寒無以自給，生活極不安定外，其叔父朱芾園的影響，也是因素之一。《國朝先正事略》說他「年十七，棄舉子業，肆力於古學」。而據《行述》，則應為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即竹垞十二歲時事。是歲，浙東西大饑，人相食，竹垞家亦至絕食。當時，芾園語竹垞：「河北盜賊，中朝朋黨，亂將成矣！何以時文為？不如舍之學古。」乃授《周官禮》、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楚辭》、《文選》。這，從此決定了他從事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。表面上看來，朱芾園讓竹垞放棄舉業，改學古文，是由于時局混亂。究其實，恐另有原因在。若按《國朝先正事略》的說法，竹垞當時是十七歲，亦即公元一六四五年，恰好是順治二年，清朝定鼎之第二年。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。又據《行述》，芾園極其推崇黃淳耀文，曾以其稿授竹垞，囑研習之。一六四五年，也正是黃淳耀抗清失敗、不屈殉難的一年。這很值得玩索。何況，芾園之兄，即竹垞的大伯父朱茂暉（死於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，竹垞為其繼子），晚明時曾為復社領袖。這中間的蛛絲馬跡，自更不容忽視。

竹垞的曾祖父國祚為明朝重臣，祖大競亦曾仕宦多年。生長於這樣官宦人家，少年朱竹垞自然會受到薰陶和濡染，父祖輩對他灌輸過民族意識和綱常大義，亦所必然。這就成為他日後參與抗清活動

的一個思想根源。據《行述》，竹垞「乙未始游山陰，過梅市，訪祁氏昆弟，留數月。」乙未是順治十二年（一六五五），竹垞二十七歲。祁氏昆仲，指曾任南明右僉都御史、巡撫江南、在清軍破杭州時以身殉明的祁彪佳之子祁班孫、理孫兄弟。梅市是個小地方，竹垞留連竟至數月之久，其過從之密，概可想見。儘管由於竹垞晚年自編的《曝書亭集》，刪去了記述與祁氏兄弟交游的一部份有關礙的作品，對這一段經歷諱莫如深，似已變得撲朔迷離了。但我們仍然能從他自己的或別人的作品中側面地窺見一些內情。例如竹垞《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》一詩中，有句：「東海賦垂釣，西山懷采薇，一爲歌白雪，高調和應稀。」就不是一般的酬應之作，而是充分肯定了祁氏兄弟的明遺民的身份地位及其抗清意志，并寄托了竹垞的深沉的故國之思。又如竹垞另一首《梅市逢魏璧》，指出爲國事連年奔走西東的魏生，雖窮困潦倒，鬢髮盡白，仍不改初衷。詩中還盛贊「山陰祁生賢地主，好奇往往相傾許」。最後竹垞勸慰魏生，雖則所謀未成，「百年強半成蹉跎」，但不可灰心喪氣，「天生汝才豈庸下，何爲抱膝獨悲歌」？透過此詩，竹垞與祁氏兄弟、魏璧之間的親密關係，自不難概見。此外，竹垞確曾參加過抗清活動，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：

一、竹垞與明末抗清志士、遺民詩人，都保持着密切聯繫。據《行述》所載，竹垞於一六五六年曾去嶺南，在那裏呆了兩年，與屈翁山（大均）、陳元孝（恭尹）交游甚密。屈、陳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家。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隊伍，進行武裝鬥爭，兵敗後，削髮爲僧，後又還俗，與顧炎武、李因篤等交往，以布衣終。陳恭尹父因抗清犧牲，他自己曾被明桂王授爲錦衣衛指揮僉事。桂王敗亡後，隱居不出。竹垞留粵達二

年，顯然是有活動的。《曝書亭集》有關這方面的吟咏，多係流連光景、詩酒酬贈之作。這是竹垞在有意迴避。不過，就集中所收一部份涉及屈大均的作品，如《喜羅浮屈五過訪》、《寄屈五金陵》、《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》聯句、《同杜濬、俞汝育、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》、《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》、《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》、《寓山訪屈五》等這些早期作品，以及屈大均贈竹垞的詩來看，則兩人過從之密、交誼之篤、志趣之相投，灼然可見。竹垞比翁山於屈原，以爲其所爲「皆合乎三閭之老」（見《九歌草堂詩集序》）。又如竹垞《將歸留別粵中知己》一首，寫到「于役既有年，歸哉方自今」。可見留粵二年，并未悠游自在。至于「于役」的內容，何以自今方歸的原因，都未細說。全詩哀婉淒苦，所謂「行邁日靡靡，憂心亦欽欽」云云，就不是一般的離愁別恨了。

二、康熙七年（一六六八）二月，顧炎武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發被捕入獄，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，始獲釋放（據《顧亭林詩文集·出版說明》）。按《曝書亭集》未見有竹垞贈顧炎武或任何有關顧的詩，僅有一篇《與顧寧人書》，純係論文，不及其他。而《亭林詩集》則還保存着一首五言長律《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》，全詩二十四句，十二韻。是否即係竹垞《與顧寧人書》所說的「贈以長律二百言」，待考。不過，從亭林詩中「吞聲同太息，吮筆一酸辛」、「自來賢達士，往往在風塵」等句看來，除了對竹垞備極推崇之外，兩人存在着不同尋常的情誼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至於李因篤、亭林曾作書與李湘北，促其准許李因篤歸養老母，并爲李父撰寫墓志銘（見《亭林文集》）。凡此，也可以印證他們三人的關係。另，竹垞與魏禧交誼甚厚，魏乃明末諸生，明亡後不食周粟，隱居翠微峰，也是有名的遺民文人。

三、竹垞爲朱士稚撰《貞毅先生墓表》一文中，也透露了此中消息。朱士稚是明顯宦之後，父官雷州知府，祖曾爲明大學士，與竹垞家世極相似。竹垞早期詩作中，有《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呂師濂祁理孫、班孫分韻得泥字》，以及《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》、《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》。後者寫得頗爲沉痛，但不具體。而《墓表》則談到士稚「遭亂，散千金結客，坐繫獄論死。宗觀號呼於所知，歛重貲賄獄吏，得不死」。又說到士稚出獄後，「放蕩江湖間，至歸安，得好友二人，其一，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。自是，每出則三人俱。至長洲，交陳三島，已，交予里中，交祁班孫於梅市，後先凡六人」。還說到士稚死後，「二人渡江，經濟其喪，視歛含」。「予與祁子臨穴，視其封，慟哭而去」。最後，說到死者之親屬「曾以狀至歸安，乞二人志其墓，而二人者，皆不果」。又明年，「二人坐慘法死，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」。這段話包含着許多隱情，儘管敘述時閃爍其詞，若細加尋繹，仍可知其大概。

此文係作於康熙元年（一六六二）或稍後。其事全祖望《雪竇山人墳版文》等言之甚詳。這裏所謂的朱士稚「散千金結客」，分明是一種抗清活動。後來至歸安（今浙江吳興），得好友二，其一即魏耕，又名魏璧。另一當是錢纘曾。加上竹垞、陳三島、祁班孫，「後先凡六人」。他們往來吳越，爲國事奔走。所謂「以詩古文相砥礪」，不過是個幌子，遮人耳目罷了。這六人志同道合，密謀共圖大事，在共同鬥爭中結成深厚情誼。竹垞也坦率地承認，「當予與五人定交，意氣激揚」。這，除了文字之交，顯然還有更牢固的精神紐帶在。如今，「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，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」，只剩下竹垞一人，爲

了避禍，不得不奔走於道路，跑到浙江南部的永嘉去。一般墓表之類，屬於應酬文字，語多泛泛，而竹垞此文却大異於一般，寫得既沉痛，又真摯，可說是捶胸頓足，字字血淚。若非并肩戰鬥的患難至交，斷難至此。我們讀了這篇文章，再參照全祖望《雪竇山人墳版文》和其他有關資料，則於竹垞早年曾參與抗清活動一事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。

遺憾的是，竹垞中年以後，竟一改初衷，應清王朝「博學鴻詞」之徵，與李因篤等同時以布衣除檢討，未幾罷歸。竹垞以明顯宦之後，磨劍十年，結客五陵，聲華藉甚，終不免於輕出，論者惜之。

二

竹垞的文學作品，詩占了較大比重。清詩與明代之偏於宗唐有異，受宋詩影響較深，清人宗唐而取得成就者很少。而學宋，作為一種風尚，幾乎與有清一代相終始。尤其是清初幾位有影響的詩人，如錢謙益、黃宗羲、吳偉業、查慎行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得益於宋詩。稍後的首倡「神韻」說的王士禛，其中年為「避熟求新」，也「越三唐而事兩宋」。朱彝尊早年宗杜，認為杜詩：「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，而寫時狀景之妙，自有不期工而工者。然則善學詩者，舍子美其誰師也？」可謂推崇備至。他步武七子，追蹤唐音，強調：「明詩之盛，無過正德，而李獻吉、鄭繼之、二子深得子美之旨。」（均見《與高念祖論詩書》）并引西泠十子為同調。到了晚年，他一方面仍取法於唐，堅持明七子、西泠十子的宗風，一方面又在學唐人而具體之後言宋，博采宋人之長，標舉黃庭堅。

竹垞對明詩的評價與清初詩人不同。當時，錢謙益等人曾對明七子獨尊盛唐的擬古之風深表不滿，他指責李夢陽曰：「必曰漢後無文，唐後無詩，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，直待獻吉而洪荒開闢乎？」黃宗羲對七子之獨尊盛唐，貶抑宋元，也認為是絕對化了。他為張心友詩作序時曾說：「詩不當以時代而論，宋元各有優長，豈宜構而出諸於外，若異域然。即唐之時，亦非無蹈常襲故、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。」竹垞也察覺到一味宗唐者之失，從而指出：「自陳先生子龍倡為華縵之體，海內稱焉。二十年來，鄉曲效之者，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。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，以為不足傳，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。」（《錢舍人詩序》）他與黃宗羲都主張學唐應致力於得其神理，反對模其形似，亦步亦趨。同時，竹垞也批評過學宋者之失，謂：「今之言詩者，每厭棄唐音，轉入宋人之流派，高者師法蘇、黃，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，叫囂以為奇，俚鄙以為正。譬之於樂，其變而不成方者歟？」（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》）他既非盲目地宗唐，亦非無條件地學宋。他不贊成錢謙益等一筆抹倒明七子的偏頗態度，也對七子持有一定的保留。他在《王先生言遠詩序》中曾指出七子機械地界劃唐詩，「斤斤於格調聲律之高下，使出於一」，「以唐人之志為志」，結果，「辭非己出」，而流為「剽賊」。他自稱「于詩學之四十年，自少壯迄今，體製數變」（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》）。這種變，是「知正而言變」（《丁武選詩集序》），是象某些宋人作者那樣，「學唐人而變之」，并不是要「軼出唐人之上」，更不是「舍唐人而稱宋」，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（均見《王學士西征草序》）。稱宋的前提仍然是學唐，如果不曾目睹金唐人之詩而言宋，那是「不足師」的。變，也要在這個基礎上變，這樣，才能「變而成方」，「臻古人之域」。歸根到底，宗唐是正，有宋是變，

本來不可倒置。這正是竹垞經過多年探索，順應着年齡的增長，環境的變化，最後確定的詩歌主張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認為竹垞詩「至其中歲以還，則學問愈博，風骨愈壯，長篇險韻，出奇無窮」。趙執信論清詩，則以竹垞、漁洋為大家，謂「王之才高，而學足以副之；朱之學博，而才足以運之」。秋谷於清人，持論甚苛，少所首肯，故這一評價，亦足以概見竹垞詩自有其面目。朱、王有共同處，他們都有鑒於「宋詩質直，流為有韻之語錄；元詩綽豔，流為對句之小詞」的弊病，有志於力矯清初「談詩競尚宋元」的風氣。故早年都標榜盛唐，又都是古體崇王、孟，律以杜甫為法，二人亦各有所得。朱功力不亞於王，惟為詞名所掩，加上其他因素，以致未能如王之理論上自成一派，創作上富有成果，領袖詩壇垂數十年之久，成為一代正宗。

當明亡時，竹垞還是十幾歲的少年，清兵入浙，他親歷過國破家亡、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。二十一歲客山陰，與祁彪佳之子理孫、班孫相過從，與抗清志士共同參與了鄭成功、張煌言進軍長江的密謀。事敗後，他避禍溫州。直至五十歲那年，出應清廷博學鴻詞試中式，以布衣被授翰林院檢討，當了一名小小的七品官。這是他一生的轉折。經過長時期的深自韜晦和奔走逐食，青年時期的銳氣早已消磨殆盡，如今走上了仕途，地位變了，就更加謹飭穩練了。詩的風格自然也與早、中期有所不同。他晚年手定的《曝書亭詩集》，其中大量保存的是應酬贈答、模山範水、花草蟲魚、咏懷古跡以及嘲風弄月、豔情、閑適之作，已很難找見早年鬥爭生活的印跡。而與祁氏兄弟、魏璧等的一段往事，尤極力隱諱，其有關詩篇，多被刪削，所存者僅詩酒流連、飲宴唱酬之什。能反映那個時代面貌的，有他十八

歲時所作的《曉入郡城》和十九歲時所作的《舟經震澤》二首。前者透過「壞籬」、「古道」、「孤城」、「兵氣」、「昏烟」等富有特徵的景物描寫，着重渲染了郡城嘉興兵燹之後的殘破景象和作者的悲苦惆悵（其《悲歌》所云：「我欲悲歌，誰當和者，四顧無人，輦輦曠野。」所表達的是同樣心情）。後者則憑弔了太湖抗清義軍首領吳易，通過象徵和比喻手法，寄托了作者對這位「節士」的景仰和懷念，頗有現實意義。集中《捉人行》、《馬草行》正面揭露清兵和官府擾害平民的罪惡行徑，滿紙辛酸，深得杜詩、白居易樂府的遺意。《玉帶生歌》取材于文天祥故物，寫來慷慨悲歌，音節蒼涼。通過咏硯，作者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氣節和謝翱的情操。沈德潛曾評此詩云：「小小一硯，傳出信國之忠，舉羽之義。」又曰：「硯與信國雙收，是何神勇！」可見評價之高。《鴛鴦湖櫂歌一百首》，規模宏大，格調清新，不失為《竹枝》遺響，其描繪浙西水鄉風土人情，頗具特色，一時和者甚衆。竹垞早年游甌，所作甚夥，不乏可觀。其中，如《永嘉除日述懷》、《東甌王廟》，皆五言長律，既饒性情，又極見功力。北游雁門諸作，風格沉雄蒼勁，寄托遙深，均屬上乘之作。如《土木堡》：

平蕪一簣狼山下，九月驅車白霧昏。到眼關河成故迹，傷心土木但空屯。元戎苦戰翻迴蹕，諸將論功首奪門。早遣金縢和社稷，祠官誰奉裕陵園。

全詩痛于謙之死，譏英宗庸劣，斥諸將奪門之誤，結句尤饒餘味，愛憎十分鮮明。

又如《宣府鎮》、《雁門關》等亦屬此類，借咏懷古跡，寓故國之思，宛轉低回，一唱三嘆。至如其他弔古之篇，如長律《謁大禹陵》、《岳忠武王墓》、《于忠肅公祠》、《謁劉文成公祠》以及五律《文丞相祠》、《濂

水弔韓淮陰等，議論正大，感慨深沉，格律精嚴，堪稱力作。餘如酬應諸篇，亦時有佳什。如《逢姜給事採》、《送林佳璣還莆田》、《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盛話舊二首》等，亦明心見性，絕少矯飾。除此而外，在他後期作品中，感情真摯，手法新穎，較有個性的作品就一般不多了。但既遭貶謫，政治上受到打擊，中心鬱結，遂不無怨憤之詞，間於時政有所譏刺，亦自難免，不過是手法更加含蓄隱蔽罷了。

總而言之，竹垞詩，就其思想內容而言，前期有不少傷時感事之作，其中若干篇章且能直接觸及社會政治，反映民生疾苦，中期浪游，所作多弔古傷今，其胸中磊落，隱約於字裏行間，後期則以寫生活瑣事及閑情逸致為主，較為可觀者無多。尤其是侍宴、侍食、歌功頌德以及某些《閨情》、《閑情》之類的作品，格調卑下，表現了封建文人熱衷利祿及其輕浮儂薄的通病，乃是集中的糟粕，不可不加以區別。

竹垞晚年兼取宋詩，但其重點仍在宗唐。已如上述。他本是學者，精於經學，與黃宗羲交游，論詩受其影響，曾表示：「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？」（《棟亭詩序》）這裏的學，指的就是經學，他是認為不通經便無以為詩的。這種論調，儘管不無可取之處，却也體現了他的封建的正統觀點，極易產生流弊。竹垞讀書既多，作詩免不了掉書袋，那首著名的《風懷二百韻》，便是用大量典故堆垛起來的。又如《齋中讀書》十二首，很有點「以文字為詩，以議論為詩」的味道，雖未必是有意蹈襲宋詩，總不無影響。趙執信曾譏刺朱詩「食多」，沈德潛在《說詩碎語》中也提到：「放翁七言律，隊伍工整，使事熨貼，當時無與比埒。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，多至四十餘聯。……然亦足為貪食多者鏡矣。」意思是說，詩之「食多」，非自竹垞始，竹垞的「食多」，原是有師承的。但此事歷來看法不一。錢仲聯說：「趙秋谷《談龍錄》論詩，頗議竹垞『食